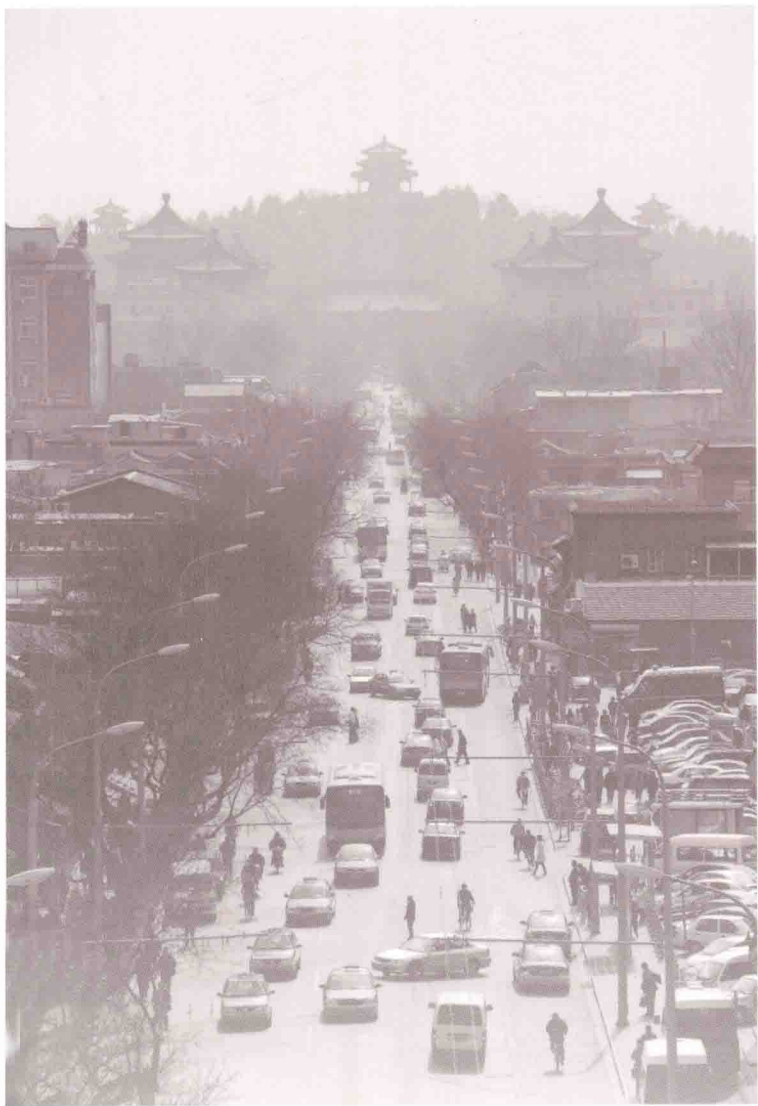


亲历现代中国

北京民众的生活智慧与情感体验

杨善华 —— 编



文
景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亲历现代中国

北京民众的生活智慧与情感体验

杨善华——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历现代中国 / 杨善华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7-208-12319-9

I. ①亲… II. ①杨… III. ①社会变迁—研究—中国—20世纪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8792号

责任编辑 朱艺星
装帧设计 园里



亲历现代中国
杨善华 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284,000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319-9/C · 464
定 价 49.00元

目 录

理解普通民众与他们的生活世界（代前言）	1
烧锅炉的老北大	11
胡同里的镶黄旗	39
胡同里的镶黄旗（回访）	51
追求不一般的西城小柳	67
甘愿平淡的柳大姐	89
渡尽劫波今独在，千头万绪忆逝年	131
勘破人生真谛，隐做市井凡人	159
九旬沧桑话当年，西安事变在眼前	187
当工人也得有一身正气	205
积淀生活经验，取到和谐真经	229
为家庭操心也得有智慧	265
共产党培育我成长	301

理解普通民众与他们的生活世界 (代前言)

杨善华

2003年，笔者曾提出：“20世纪这一百年是中国城乡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社会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断裂，而仍然体现出一种延续（至少在外观上是这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的社会延续是通过生活在中国社会中而又跨越了不同时代的人的延续表现出来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前提，我们才有可能通过对人的记忆的发掘，去追溯历史事件的真相，进而在微观层面达成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史的把握和描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致与宏观层面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史的把握和描述相互印证，并在某种意义上补充和完善宏观变迁史这样的目标”。^①对普通民众的口述史研究的目标与可能就在于此。这既表明我们的研究视角一定是历史社会学与现象学社会学的结合，也可以说是我们编辑这本资料集的初衷。

收在现今这本书里的访谈录音整理源于自2002年开始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文化与人际关系”这一课题。这本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1997级本科生史征同学的一个建议，他在2001年写毕业论文时跟我说北京的四合院这种居住方式形成了北京独特的地域文化，也对生活在四合院中的市民的人际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考察四合院文化的特色和这种文化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其实是很有意义的。我觉得他的建议有道理，就在北京市妇联研究室的帮助和支持下，联系了西城区厂桥街道后海社区以及当时的宣武区天桥街道，在2002年5月和9月分别在这两

^① 杨善华：《历史社会学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城乡百年变迁（口述史的视角）》。

个社区中进行了入户访谈。因为考虑到对北京社会变迁的了解，所以希望居委会多帮我们找一些经历过解放前生活的岁数大的老人。我跟程为敏老师带着我们的一些研究生与1999级本科生最终利用四个周末的时间在两个社区一共访问了33人，整理出约34万字的访谈资料。后来在做“社会转型期北京市民家庭代际关系研究”这一课题时，在结束了问卷调查后又在西城与宣武两个区联系了一些愿意接受访谈的被调查者，在2003年和2004年我们带着2000级和2001级本科生访谈了39人，整理出大约48万字的访谈资料。之后对北京市民的访谈就和家庭社会学课程的实践结合在一起。^①这样自2004年后规模就小了些，每年在北京城区访谈7-8人次。读者可以看到，收进这本资料集的被访者基本上属于2002年到2004年接受访谈的家居西城和宣武的市民。

翻阅本书时读者可以发现，我们访问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当然这与我们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兴趣有关，我们本来就想“小中见大”，通过这些小人物的经历来透视20世纪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伟大的社会变迁以及这样的变迁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同时我们也想知道民众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社会变迁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访问的都是工人、家庭妇女、居委会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笔者在2004年写的《理解普通妇女与她们的生活世界——兼谈女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曾经这样说过：“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在中国城乡社会中占女性人口多数的非精英群体即普通妇女群体，这样的妇女既非政治精英，也非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但却是城乡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她们的思想轨迹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现代中国，尤其是1949年后的社会变迁的深入影响。”她们“并非‘后知后觉’，因为她们有着对自己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清晰和理性的认知，知道如何在观念和行动方面达到和社会环境的协调，以获得自己生

^① 从2003年起，我将这个课题与我负责的研究项目“历史社会学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城乡社会百年变迁（口述史的视角）”结合在一起，并在2006年争取到了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的经费支持。经费由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转拨。在此向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和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致以衷心的感谢。另外要说明的是，这个项目包括了北京市，也包括了其他地区的农村，因为这是城市访谈的资料集，所以不提及农村的情况。

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空间；知道如何将自己个人的利益融入家庭（家族）或集体的利益，以在‘家本位’或‘集体本位’的体制下获得‘自主性’；在她们的意识和行动中同样有着中国妇女几千年所积累的生存智慧的显现”。这些判断显然适用于收入本书的女性受访者。

但是，如果撇开性别视角，我们就会看到对男性受访者来说，其实也是如此。因为在中国社会中占了人口大多数的正是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就人口来说，他们构成了我们的社会基础的主体部分。他们的生命过程，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深刻）体现了社会的意志和社会对个体价值观和行为的形塑。当然我们也看到，社会意志的体现（首先表现为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社会对个体的形塑是会因个人社会身份的不同而呈现出某种差异的（在许多时候它甚至表现为一种质的差异），然而这种个人社会身份的不同通常是被一些社会学家称为先赋的因素（例如个人所出身的家庭所属的阶级或阶层）所决定的，这就使这样的社会意志的体现和社会的形塑表现出很强的社会分层的特征，因而具有立体性。虽然从启蒙运动开始，思想家们就一直在强调人的平等，但是只要社会分层这样一种社会分化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就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我们只有将社会的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都作为我们的考察对象才能获得对社会的全面的把握和认识，而且也只有这样全面的把握和认识才能深刻触及社会的本质。

反过来，小人物对社会的反作用同样是巨大的。记得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针对旧社会的改造曾有一句名言：“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①而在这样的习惯势力背后就是人性和与人性相连的人的欲望。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才会有“民如水，君如舟”、“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执政理念。由此延伸，我们可以对人的社会行动空间的被创造和扩张给出一个更符合实际的解释，即这是维护和扩张自身及自身所从属的社会集团的利益的需要，是通过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既有制度加以变通的结果。一般来说，这样的变通恰恰是抓住了制度本身的不健全或操作层面的漏洞（其实只要是制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9卷第24页。

度，都会有这样的不健全或漏洞)。

在《理解普通妇女与她们的生活世界》一文中笔者还认为，“等到我们真正进入普通妇女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她们生活的平凡，这种平凡就如同我们对‘日常生活’的一般定义：重复，单调，没有英雄史诗般的传奇，也没有置身政治和生活旋涡之中的紧张和激动。即使是类似生老病死这样的个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似乎也与他人雷同。但是，这正是普通妇女生命历程的特点，是她们的共性。而且，只要揭开这样的表象，我们会发现她们的生活仍然充满了意义。这样的意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她们自我或者人格的形塑与再形塑是在她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完成的，因此，她们对自我的定位不可能不受这种环境的制约。”而且，在她们“能动地适应或者改变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时，她们也赋予了社会环境一定的意义”。这同样也是我们要去理解普通民众及其所置身的生活世界的原因。一方面，他们自我的形成和人格的形塑离不开社会的影响，正好可以由此去透视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在行动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使他们赋予生活世界的意义变得多姿多彩，不论是对利益的维护还是对风险的规避，都有中国人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人生智慧的闪现。总之，它可以让我们窥视到社会“恒常”的一面，从而达致笔者在《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前言中所说的“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生活”，也即按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社会的目的。因此，在对这样的访谈资料的解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普通民众为解决各类生活问题而实施韦伯所言的“社会行动”时，他们有着非常清楚的意识：他们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现实世界中“生存”下去。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和普通，但是在思想史的范畴内，人如何生存下去，或者以何种方式生存下去却是一个最为核心和久远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也将人的生存问题看作是他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起点。因为人要生存，才有对周围环境的认知，而有无认知以及如何认知又决定着人对环境的适应和改变的成功与失败的程度以及在做出这样的适应和改变时所体现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本书所辑的11个被访者的共同的特点。

既然需要认知，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认知什么。毫无疑问，普通民众需要认知的首先是他（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亦即舒茨所言的

现实的“生活世界”^①。这个“现实”的生活世界，即便如舒茨所言，是“多重”现实，却依然是普通民众知识的本源。而生活世界的“预先给予性”则使得每一个面对生活世界的人在认知的时候都必须去面对历史，面对以口头和书面的他人经验的形式传于认知者的各种知识（尤其是关于社会、关于自身如何生存的知识）。对那些接受这些知识的认知者而言，这些知识无一不是已经经历了很长的一段历史，并可以归为传统的组成部分。而这些认知者参与创造的社会情境（如舒茨所言）及知识又会成为后人的知识来源从而也被归于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所面对的现实生活世界或社会现实，就一定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当我们用这样的观点去探究被访者及其讲述时，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探究无非是对文本（包括书面与口头）与社会现象的考察。但是无论是文本还是社会现象，应该都是当下的，实存的，是可以被研究者感知与认识的，因此有现实性。但是这样的现实性的背后，一定蕴含着历史性。因为即便是一个访谈对象，当他（她）坐在我们面前准备接受我们访谈的时候，他们所呈现的，正是他们生命延续的结果，并且，他们

^① 舒茨的学生那坦森曾将“生活世界”简扼概括为“包含人所牵连的种种日常事务的总和”。舒茨认为，生活世界是与“自然态度”与“主体间性”这两个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指出，处在生活世界中的人，其基本特点就是自然态度，它使人们认为生活世界是不言自明的现实，这些抱有自然态度的普通人都会想当然地接受它。生活世界对普通人来说是毋庸置疑的。而普通人的任何社会行动，对世俗问题的任何考虑，都是以这一不言自明的生活世界为前提的。社会行动既然意味着与他人打交道，则生活世界自然不能被无视，因为它正是个人与他人的任何社会交往的前提。人们的自然态度使生活世界从“我们的世界”变成了“我们的世界”。舒茨认为，这些被普通人想当然接受的自然态度包括：（1）他人是具有肉体的存在；（2）他人的身体具有和我自身在本质上一样的意识；（3）外在世界中的事物对我们来说是同质的，意义也基本相同；（4）我可以与他们打交道，并相互采取行动；（5）我可以使自己为他人所理解；（6）一个已经层化的社会文化世界是作为一个参考框架被预先给予的，这种给予方式使普通人想当然地将其视为“自然世界”；（7）由于（6），我发现自己置身其中的情境只有一小部分是我个人创造的。——参见李猛：《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载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19页。

一定是将自己的“生平情境”^①带入了访谈现场的。同样，他们的讲述既有对以往经验的记忆，也有对人生与社会的认识和总结，而这种认识和总结一定是以相当数量的时间耗费为前提的。即使我们考察的是人的行动，就其背后蕴含的规范特性来说，也一样有历史性。在舒茨看来，在群体层面上的这种历史性知识，会在群体之中（in-group）形成共有的知识，并且会以一种“理所当然（of-course）”的方式，具备道德意涵。在许多时候，它“也是民俗、风俗的起源，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是‘传统性行为’的起源，是圈内人的除了歧见之外所公认有效的‘理所当然的陈述’”（Schutz,1962: 13）。这一知识有其历史性起源，是“我们的‘社会性遗产’的一部分”（Schutz,1962: 13）。对于这一“社会性遗产”，韦伯和伽达默尔均在其工作中主张加以重视^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现实和历史、当下和传统其实是无法分开的。而认为被访者因为中国城乡社会变迁变成了传统彻底的摒弃者显然也是片面的。

当然，我们承认，普通民众在认知现实的生活世界时，尽管会用一

① 舒茨认为，个体自童年时代开始起就通过自身的经验与父母、朋友、老师的言传身教获得认识、界定和适应环境，应付各种事件及生存所需要的各种诀窍等方面的知识。这样的知识由日常语言和方言的命名而类型化。对个体来说，这样的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类型化知识自童年时代始不断积累，把这个世界既作为现存对象来接受，也作为具有过去和未来的对象来接受。这样的类型化知识和他在生活过程中获得的具体经验，共同积淀成为经验储备；后者即是他此后理解社会现象、采取相应社会行动的基础。另外，由于个体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由特定的人群哺育起来的，他因而具有特定的欲望、兴趣、动机、性格、抱负，以及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信仰，所以，由这些经验和知识构成的经验储备具有鲜明的个体特征，舒茨称之为个体的“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在这里，“生平”系指个体经验储备形成的历史性。（霍桂恒：《舒茨》，载苏国勋主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② 韦伯强调在研究之中对于此种意义的重视：“我们无法通过对经验材料的‘无前提的’研究揭明什么东西对我们有意义。相反，确定某物的意义是它成为研究对象的前提。”（韦伯，1998，27）韦伯在此清楚体现出了他对于诠释学传统立场的选择。而伽达默尔在回顾现代科学的兴起时也总结说，科学与启蒙带来了一种对于民族历史的“前见”的怀疑与摒弃：“对一切前见的根本贬斥——这使新兴自然科学的经验热情与启蒙运动结合起来——在历史启蒙运动中成了普遍的和彻底的倾向”。（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54页）然而正是在这里，伽达默尔提出，这是诠释学传统尝试“必须开始起批判的关键”。（同上，第356页）

种舒茨所言的“理所当然”的态度去接受他们需要获得的种种知识，但是他们的认知仍然会有一种主观能动性，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实践来决定肯定什么，否定什么，从而做出认知方面的选择。然而正是因为这样，多数民众共同接受且不管社会变迁如何而长期未见改变的、如上文所述的“社会恒常”才更具社会学的意义。而当我们通过话语分析去捕捉文本中这样的“恒常”时则需要借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福柯认为，考古学这个研究领域是指“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学问、哲学观念、日常意见，以及各种制度、商业交易或者警察活动，都要涉及某种这个社会特有的潜在的知识（savoir），这种知识与我们可以在各种科学著作中发现的那种学问体系明显不同，但正是这种知识使某种理论、意见或实践成为可能，它是知识（connaissance）、制度和实践可能性的条件”（福柯，1989，转引自李猛，1999）。福柯的见解给予我们的启发是，如果话语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那么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性话语（savoir）的背后所潜藏的、我们希望通过社会学之“还原”而获取的，使得在历史沿革之中，某些话语消失，而某些可以一直存在到今天的条件到底是什么，亦即使用话语的、作为主体的人何以在日常生活中，做出他们的选择？对于现象（比如人的行动），只要它是被规范的和存续的，我们也可以对它提出这样的问题。借助这样的方法论和方法，我们或许可以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现象去考察社会得以成为社会的基本可能性以及在中国城乡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所蕴含的历史性基础。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自清季以降的重大社会变迁以及国家借助社会变迁对民间社会的渗透对普通民众的生活、行为和观念到底有多大的改变？我们已有的研究表明，城乡社会从空间上可以划分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两部分，由国家（现代性）力量支持的话语进入公共空间相对容易，但要进入以家庭（家族）为依托的、有一大堆“婆婆妈妈”的家务事和家里短的矛盾纠纷的“私人空间”，乃至老百姓的观念和意识层面，则要困难得多，这是城乡社会的“社会恒常”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我们也可以在本书所辑的这些普通民众的访谈记录中由此去探究普通民众对自己秉持的价值和行为规范的坚守。

所以，同样是以家庭为生活的依归，生长于同一家庭的柳家姐妹由于人生经历的差异，对自己的人生目标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姜老太太的自述则让我们看到了家庭所处的社会位置对个人为自己所处的社会

阶层所做的定位是如何坚固；王大爷和宁大爷的人生经历可以使我们会对社会的认知和生存智慧的获得一定是和他们的生平情境有着直接的关系；焦大妈与韩大爷的人生经历正好是一个对比，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同样的社会变迁投射到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人生体验，形成不同的社会认知；而张大爷向我们展示他的晚年生活的不幸则可以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所有的被访者都用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要活下去或者说要生存在个人生活中永远是排第一位的。而要生存，就一定要适应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我们可以读出所有被访者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反过来，他们在生活中遭受的挫折，其实或多或少也与他们对社会的适应程度有关。

当然，编辑这本资料集还有一个意图，就是希望它可以成为如何做深度访谈的教学参考。多年的教学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从一个茫然无知的初学者到一个成熟的研究者，中间的距离绝对不短。如果不提供实践的机会，没有自己的领悟和思考，这段距离也许永远也跨不过去。现在在很多愿意接受社会学深度访谈训练的初学者还苦于没有入门的途径。考虑到这一点，在编辑的过程中笔者还在每篇访谈录音整理前面加写了编辑札记作为导读。这些札记长短不等，但都是有感而发。如果是笔者参与的，则还会加写一段对访谈场景的回忆和对被访者的印象，方便读者去理解被访者叙述的含义。通常在札记中笔者会点评被访者的叙述并对分析这些访谈材料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包括对他们叙述的“意义的脉络”可以做什么样的提炼和概括，指出哪些话语是被访者人生智慧的显现，哪些话语具有社会学的意义和价值。

点评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确立一个“好的”或者说“成功的”访谈和一篇“好的”访谈记录的标准，前者当然也要通过后者的来体现，但是前者更关注的是记录中表现出来的访谈场景以及访谈者与被访者的互动。在对宁大爷的访谈记录的点评中笔者指出这是一个“成功的访谈”，并提出“成功的访谈”的标准是：（1）访谈气氛好，被访者配合，能畅所欲言；（2）访谈者能敏锐感知和把握访谈的关节点，提出恰当的问题以引导访谈深入；（3）被访者记忆清晰，叙述清楚，访谈信息量大；（4）故事和细节好，能启发研究者思考，可做进一步的提炼和概括。应该说这个访谈记录在这四个方面都有所体现。而对焦大妈访谈的记录则

提供了一个录音整理的典范。因为阅读这样的记录不仅会让你真切感受到访谈当时的气氛（甚至可以帮助一个未参与访谈的人进入访谈场景），还有助于参与访谈的研究者借助整理的录音回忆起访谈当时一些重要的但又无法记录到录音整理中的细节，这样的录音整理才有长时效的研究意义。正如笔者在焦大妈的访谈记录的编辑札记中所言，好的访谈整理应该能够还原当时的访谈场景，因为一次访谈其实就是由访问者和被访者共同创作的一件作品。而且，这样的作品是不能被复制的，这是因为访谈过程是被访者和访谈者的互动过程，双方虽然都有自己的意图（访谈意图和叙述意图——向被访者问什么，向访问者讲什么），但是问答循着一个什么样的路径发展或深入，这必须要看互动当时双方对对方话语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即时反应。有鉴于此，一次访谈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件即兴创作。这可以说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访谈之后一点由衷的体会。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我们对好的访谈和好的访谈记录的标准也处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中，也是在实践中逐渐明确和完善的，所以读者在阅读这些访谈记录时会发现在格式上未能做到完全统一，因为这真实反映了这样一个探索的过程，又因为它不影响读者阅读和理解，所以我们就保留了记录整理时的原样。

最后我要感谢程为敏、刘小京和罗沛霖，作为一个团队的成员，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才使本书有可能编成；同时我还要感谢所有参与访谈与录音整理的1999级、2000级、2001级、2005级本科生与我们研究团队中的同学，这本小书的出版也离不开你们的辛勤劳动，特别要说的是，杨可细致周到地为书稿做了大量的文字编辑工作，没有她的努力，这本书稿也不可能面世。最后，我还要感谢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多年来对我们研究的大力支持，这几年我们能取得这样一些成果与应用科学系的支持显然是分不开的。

烧锅炉的老北大

编辑札记：跟韩大爷的谈话其实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笔者觉得反常，疑惑，但是决定不反诘不追问将谈话继续下去。第二部分就是跟韩大爷摊开直说，使他决定不再继续圆他开始编的假话，从而让访谈回到说真话的轨道。

记得那天上午走进韩大爷家门，笔者就有反常的感觉。如访谈开始时，居委会干部是很自豪地将对韩大爷与他老伴这对孤老的照顾作为街道和居委会帮助低保老人的政绩来介绍的。我们进屋的时候韩大爷正在吃早饭，作为一个从事经验研究的社会学者笔者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观察的机会。当时看到韩大爷吃的是饺子，觉得他们生活还算可以。但是打量一下他家室内陈设立马有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感觉，屋里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家具，连彩电都没有。再看老两口的外貌都是皮肤细嫩皱纹很少，不像是底层出身的人，但却住在这样一个大杂院中——这背后一定有故事。心里存着这种想法，笔者就对受访者的言语行动格外注意。安排坐下后韩大爷开始说那番充满套话的欢迎词（参见访谈记录中开始那段），只见他忽然站起来，开口就是“报告”两字。当时笔者心中一个直接反应是：这不是监狱中犯人和管教说话的姿势和用词吗？而且后来他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基本上都是先站得笔直，然后再说话，还大都是以“报告”开头。这可以肯定是多年养成的行为习惯，也是当事人不可能加以掩饰的细节。再联想到他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老北大法律系的毕业生，在新中国成立后那么紧缺人才的情况下居然会到袜厂去织袜子，所以在访谈进行了三分之一的时候笔者心里已经肯定他一定在监狱中被关过多年。这才是对他的话语和行动的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根据

以往的访谈经验，笔者知道他们老两口在昨晚接到今天我们要来访问的通知后一定商量过明天如何应对，而他们采取这样的应对策略也一定有他们的苦衷。所以作为主访笔者决定就这样问下去，等到时候可以了再揭开。

由生活史入手的访谈的一大好处是被访者不太容易掩住他们不想讲述或者想隐瞒的事实。比如韩大爷说在31中学当临时工去烧锅炉一直干到77岁，这太离谱了（如果前面是刑满释放就业那倒也基本符合事实，只因为他没有如实说前面这一段这才离谱）。在问到三年困难时期他们是怎么度过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破绽，当笔者问韩大爷老伴他是不是跟她一起时她居然笑着说不知道，让我们直接问韩大爷自己。这和后面的去31中烧锅炉在时间上根本无法对上。所以笔者马上转到问去31中烧锅炉的时间（不过如果仔细阅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发现韩大爷的老伴在前面讲自己家事情的时候其叙述还是基本可信的）。所以等到后边笔者将事情挑开之后韩大爷的叙述就流畅了，事情也清楚了。

访完韩大爷出来，我们大家也是无话可讲。从1951年29岁被捕到1979年57岁回到北京，韩大爷几乎是在劳动改造中度过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听到他在访谈中两次自豪地提到自己烧锅炉烧得特别好时，笔者心里不是喜悦而是苦涩和辛酸。新中国的成立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用我们社会学者的行话来说是伟大的社会变迁。但用韩大爷的话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两个相互“敌对”的党，地主阶级和工农阶级是“敌对”的阶级。所以一旦新政权建立，它必然要对敌对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此时个人的道德评价之高低几乎没有作用，专政首先看你从属于哪个阶级，韩大爷的不幸就在于此——他既出身在将要被新政权专政的阶级中，又是领导旧政权但现在已经被推翻了的国民党的成员，因此必然会成为新政权专政的对象。两个阶级的斗争就是这样影响了一个人及其亲属一辈子的命运。

访谈时间：2008年12月23日上午9:00—11:00

访谈地点：北京市西城后海韩大爷家中

被访者：韩大爷（以下简称“韩”）、韩妻

访谈者：杨善华、廖炳光、孙超、街道人员、齐永峰、范金华等（文中均由“访谈者”统称，简称“访”）

访：来来来，这儿还可以坐两个……把那轮椅搬开就能坐……挤着点儿坐……这两个是低保家庭，没儿没女，完了咱们为老人服务办得不错，为两位老人免费送餐，你看这轮椅啊、被子啊、褥子啊、窗帘啊都是政府给的。

访：就是社区养老。

访：对，社区养老，这个杨教授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的生活……杨教授啊，我们的这个社区服务中心专门有人为老人送餐，分好几档，然后有一部分是我们街道，就是政府承担的，这都由政府买单，他们家还有（洗衣打扫卫生的）小时工，都是政府买单……他们俩我已经给你们介绍了，我们回居委会去了啊。

访：好好好……

访：那我们就回去了，你们自己访，他如果不想回答的问题不必没有保留的回答……

访：那个给你们添麻烦了。

韩：列位同学，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访问，谢谢，谢谢，请坐，请坐，诸位请坐……

访：大爷您坐，您坐。

韩：这儿请主任坐……

访：您坐，您坐，老大爷……主任走了……您坐，您坐，您坐这儿吧。

韩：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同学啊？

访：我们是北京大学的。

韩：北京大学的，哦，那是老校友了。

访：哦？！

韩：我 1947 年北京大学毕业。

访：那您那时候是胡适当校长还是谁啊？是胡适还是蒋梦麟啊？

韩妻：胡适校长。

韩：哦，是胡适校长，胡适的校长，地点那个是在……

访：沙滩那边，沙滩、红楼。

韩：沙滩红楼。

访：您坐，您坐，老大爷，您坐这儿。

韩：我我我……坐当中。

访：其实啊，我们在这儿做过好几年调查了，前两次来有一次就是在咱